

中国市场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与劳动收入份额^{*}

刘磊 陈逸逸

摘要: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市场中外资企业的资本来源地区来源与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利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04-2020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来源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劳动收入份额由高到底的排序为: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港澳台企业,且不同地区来源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高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比例对于地区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不同资本来源地区外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越高,外资企业的资本来源地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影响越大。不同地区资本来源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随着进入中国市场时间的增加存在向民营企业趋同的趋势。本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市场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认知。

关键词: 外资企业; 资本来源地区; 劳动收入份额

^{*} 刘磊、陈逸逸,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邮政编码: 710119, 电子邮箱: drluilei@snnu.edu.cn。

一、引言

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劳动收入份额的宏观测算标准一般为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 GDP 中劳动收入报酬占比的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李稻葵，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同时，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与国际的横向比较发现，中国宏观的劳动收入份额测算结果集中在 0.4—0.6 之间，而 Gollin 测算的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的范围在 0.6—0.7 之间。吕光明(2011)利用三种 Gollin 修正法对多国数据进行测算的结果也显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约 10 个百分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约 5 个百分点。（刘亚琳等，2023）。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微观企业层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多认为，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差异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之一。周明海（2010）利用 2003 年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起到冲击作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陆正飞等（2012）进一步发现不同级别控制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员工工资存在差异，中央国企员工的工资高于地方国企，地方国企员工的工资高于民营企业。但现有文献的一个遗憾是，大多研究将外资企业视为一个整体，并未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外资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而中国市场普遍存在的一个未经实证检验的经验感知是，不同资本来源地区的外资企业对劳动者权益的尊重程度以及对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行为存在差异。外资企业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的机构到非同质性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跨国经营活动，必然面临来自不同文化主体的摩擦与碰撞（孙早等，2014）。实际上，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与东道国（中国）在制度、文化等环境上的差异会影响到外资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风格和企业搜寻中国市场信息的难易程度。

研究发现，不同资本来源地区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动机存在差异，利用中国市场的廉价劳动力与扩大和占有中国市场等（Gillan & Starks, 2003; Fang et al, 2015; Bena, 2017）。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母国即资本来源地区文化、制度、意识和宗教信仰等特征的差异驱动了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在中国

市场上的决策行为。(孙早等, 2014)。且不同资本来源地区的外资企业获取中国大陆市场信息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当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与中国的文化、制度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时, 外商面临着很高的搜寻成本, 如寻找当地生产投入、辨认当地市场潜力、招聘技术劳工以及管理多元化的生产系统等方面的成本。这类成本促使外商采用回避投资风险的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决策行为(Buckley & Casson, 2005; Buchner & Espenlaub, 2018)。那么, 作为企业的重要决策行为之一, 不同国家(地区)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间的收入分配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呢?

有鉴于此,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借鉴 Luo (1998) 和孙早等 (2014) 的做法, 根据外资企业的地区来源地将其进行进一步划分, 研究不同资本来源外资企业收入分配行为与劳动收入份额差异。本文将外资企业分为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三大类, 具体分类情况详见表 1。利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数据, 本文考察了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和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 第一, 港澳台企业、东南亚企业和欧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具体来说, 欧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东南亚企业和港澳台企业, 东南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港澳台企业。第二, 资本来源地区劳资关系特征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劳资关系特征越明显, 外资企业的资本来源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越大。第三, 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靠近。

本文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第一, 从研究视角上丰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如前文所述, 在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中, 现有文献大多将外资企业视为一个整体, 与此不同的是, 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了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收入分配行为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 丰富了微观企业层面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第二, 本文发现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存在差异的, 劳动收入份额由高到底的排序为: 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港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第三, 对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讨论。本文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显著减小。这些发现有助于丰富我们

对收入分配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认知,对相关劳动保护政策的制订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表 1 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分类表

外资企业分类	资本来源地区
欧美企业	美国、德国、英国、丹麦、法国、瑞典、瑞士、西班牙、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
东南亚企业	日本、新加坡、泰国、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
港澳台企业	香港、澳门、台湾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首先,除市场因素外,外资企业在东道国收入分配的行为还会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资本来源地区的劳资关系特征会影响到外资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的文化、制度、宗教信仰等特征因素是根植于投资者思想意识的决策影响因素(Miroshnik, 2002)。外资企业管理者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决策会受到母国文化环境、制度、宗教信仰等环境的影响。Shi (2001)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投资上市的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的文化、制度特征等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在中国市场的决策行为。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对劳动者权益越重视,企业管理者受到母国文化、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劳动者权益也会更加重视,并反映在企业的劳资分配决策中。另一方面,不同资本来源外资企业获得东道国(中国)信息的难易程度的差异同样会影响到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与中国的文化、制度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时,外商面临着很高的搜寻成本,如寻找当地生产投入、辨认当地市场潜力、招聘技术劳工以及管理多元化的生产系统等方面的成本。相对较高的成本会促使外商投资者采用回避投资风险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决策行为(Buchner & Espenlaub, 2018)。基于此,我们提出,在经营决策的过程中,外资企业易将其本土的文化环境和东道国作比较,与东道国在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等差异更大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将其原本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手段移植到东道国(Hamel et al., 1989)。而当企业与东道国文化和制度环境较近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与资方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参考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这可能会影响

到企业的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决策行为。

其次，在中国大陆市场中，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文本与实际执行间存在弹性空间。外资企业的资本来源与中国大陆市场在文化、制度、劳资关系状况以及信息搜徐难易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是影响其在这个弹性空间中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而不同的行为选择可能导致了不同来源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差异。中国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文本与实际执行间是存在弹性空间的。其一，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中的部分法律存在模糊性（Chang & Cooke, 2015）。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以《民法》为基础的，但《民法》较为抽象，需要根据“案例指导”进行决策（陈兴良，2012；Wang & Cooke, 2016）。目前中国仅发布了 56 份案例指导，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劳动者权益相关的内容并未完整的在“案例指导”中呈现（Pringle & Clarke, 2011）。其二，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中的部分内容虽然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的文本规定，但在现实层面并未完全依照法律文本执行。以劳动者的罢工权为例，罢工的合法性已通过法律解释得到确认（Chang & Cooke, 2015），但现有的法院裁决证据表明，法官通常认为罢工行为是非法的（Wang & Cooke, 2016）。其三，当前中国每年的劳动仲裁案件平均在六十万起以上，司法系统并无足够的资源去完成每一起劳动仲裁案件（Dong, 2012）。此外，中国的地方政府间存在“引资竞争”，为了吸引更多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劳动者和资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地方政府更加偏向资方（罗长远和张军，2009；张莉等，2012）。基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文本的模糊性、执法的弹性、执法资源的不足和地方政府对资方的偏向，我们认为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文本目标和执法实践间存在着一定的弹性，这为企业在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提供了空间。

最后，我们提出，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文本与实际执行间的弹性空间内，受到资本来源地区劳资关系特征的影响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的约束，不同来源的外资企业在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的决策行为存在差异。在劳动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有着明确文本规定领域，有的会选择遵守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文本规定，但有的企业选择按照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方式进行收入分配。我们推测，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地区对劳资关系有着较高关注度且获取中国市场信息成本相对较高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弹

性空间内选择遵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文本。相反，资本来源地区对劳动者权益关注度相对较低且获取中国市场信息成本相对较低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参照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实际执行方式。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规定较为模糊的领域，不同资本来源企业可能会选择母国企业或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作为参考。我们推测，资本来源地区与中国在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等差异更大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参照母国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相反，与中国在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相对差异较小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参照中国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

对于欧美企业而言，欧美企业与中国的制度距离相对较远。大部分欧美地区所崇尚的基督教文明的个人权力的抗争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的“群体主义”大有不同，与中国存在较强的文化壁垒(Jensen & Szulanski, 2004)。一方面，欧美企业已经形成了相对而言“劳资平等”的企业文化和较为完备的工会制度(Aggarwal et al., 2011)。即使在中国投资上市，受到母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收入分配决策时，相对来说会更加注重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此外，欧美社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有着较高的敏感度，企业一旦出现雇佣童工、超时加班和在发展中国家开设“血汗工厂”等行为都会受到社会强烈的谴责和消费者的抵制(Wang & Ni, 2012; Chan & Hui, 2014)。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壁垒，欧美企业获得东道国市场信息的成本较高，欧美企业的管理者可能更倾向于将其原本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手段移植到东道国。在进行经营决策时，欧美企业会更多地参照母国企业的经营方式，较少参照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欧美企业不仅受到由制度距离引发的母国特征和获取信息成本的制约，还会受到对劳工权益敏感度较高的母国社会的监督。因此我们认为，在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在法律层面欧美企业更倾向于契合法律的文本规定。对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的领域，欧美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采用母国的收入分配模式，其收入分配方式相对来说较为保守。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1：

H1：欧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于港澳台企业和东南亚企业。

对于港澳台企业而言，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制度距离是外资企业中最接近的(Xu et al., 2010)。一方面，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内地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观念较为一致。外加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港澳台地区社会制度的建立并未

经过大规模斗争，也并无工人运动的传统。港澳台社会相对来说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意识不高。另一方面，港澳台企业与中国内地文化的趋同性使得港澳台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较低，对中国的市场环境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也较为了解。在进行收入分配时，决策者相对来说更愿意参考会参照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以达到资方获利最大化的目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港澳台企业在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在法律层面更倾向于选择契合执法实践，在法律规定较为模糊的领域，港澳台企业相对更多的参照中国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港澳台企业在收入分配时的选择倾向相对来说较为投机。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2：

H2：港澳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低于欧美企业和东南亚企业。

对于东南亚企业而言，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介于港澳台地区和欧美地区之间。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群体较多，它们所处的东亚文化圈与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趋同性（Delios & Henisz, 2003）。东南亚地区政治和文化理念更多受欧美影响，儒家文化影响力相对微弱。东南亚地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介于欧美地区与港澳台地区之间。企业管理者在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也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母国观念的影响。在获取中国市场信息的难以程度方面，东南亚企业虽不如港澳台资企业与中国内地联系紧密，但也不像欧美企业一样对中国内地涉入程度不深且存在较强的文化壁垒（Dunning, 1988）。对中国市场的信息获取难易程度也是介于港澳台企业和欧美企业之间。在进行收入分配决策时，东南亚企业会同时参考母国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因此，在法律的弹性空间内，东南亚企业的收入分配决策既不会像欧美企业一样受到母国的影响和信息获取成本的约束选择契合法律的文本，也不会如港澳台企业因为与中国内地的文化趋同和对中国市场环境与法律体系的相对了解选择贴合具体执法之间。在法律并未有明确的规定时，东南亚企业既会参考母国企业的收入分配模式，也会参考中国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其收入分配决策相对来说较为中立。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3：

H3：东南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低于欧美企业，但高于港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

三、样本与数据来源

（一）样本来源

我们的实证检验基于 2004–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由于 2004 年以前能够获得的数据较少，为保证研究的充分性我们选择从 2004 年开始对不同企业类型下劳动收入份额展开研究。我们参照既有文献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筛选和处理：（1）剔除标记有 ST 和 ST* 的上市公司（2）剔除劳动收入份额大于 1 或小于 0 的异常值（3）剔除总资产净利率小于 0 的公司（4）控制极端值的不良影响，对本文涉及的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剔除劳动收入份额在 5% 以下，95% 以上的异常值。

我们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和锐思数据库 (RESSET) 中获取有关企业性质、劳动者报酬和其他公司财务治理的信息，并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国籍，即企业资本来源的信息。我们运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来确定在中国 A 股上市的外资企业中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

（二）变量定义

本文数据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为了确定合适的面板模型，首先对样本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 $P < 0.001$ ，因此本文选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为了检验企业资本来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LS_{it} = \beta_0 + \beta_1 SOC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ROA_{it} + \beta_4 CI_{it} + \beta_5 PER_{it} + \beta_6 LEV_{it} \\ + \beta_7 AVEPAY_{it} + \beta_8 \sum_{j=2}^{21} Year_j + \beta_9 \sum_{j=2}^{19} Industry_j$$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收入份额 (LS_{it})，反映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我们参考了白重恩和钱震杰 (2008) 的方法，采用生产要素成本增加值来计算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用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来表示劳动收入，用营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之和来表示资本收入。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劳动收入份额 = 支付给职工的现金 / (营业利润 + 固定资产折旧 + 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此外，本文亦采用常进雄和王丹枫 (2011)、魏下海等 (2013) 以及王雄元和黄玉箐等 (2017)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衡量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

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设置资本来源 SOC 为虚拟变量，具体包括：FDI, 若

企业股权性质为外资企业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FDI1，企业实际控制人属地为欧美地区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FDI2，企业实际控制人属地为东南亚地区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FDI3，企业实际控制人属地为港澳台地区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本文参考陆正飞等（2012）、王雄元和黄玉箫等（2017）以及白重恩和钱震杰（2008）的变量设定，模型设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具体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营业利润率（PRO）、企业资本密集度（CI）、企业股权集中度（PER）、企业资本结构（LEV）和企业员工平均工资（AVEPAY）。此外，选取行业、年份和地区作为控制变量，以消除行业特征、时间变化以及地区差异对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解释变量是企业的资本来源，该变量为多分类有序变量，共细分为三种资本来源。为了检验不同资本来源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关系，首先我们以民营企业为基准，利用模型 1 比较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模型 2 同样以民营企业为基准，分别将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以及港澳台企业加入模型中。随后我们删除样本中的民营企业，仅保留外资企业数据，以港澳台资企业为基准，将东南亚资企业和欧美资企业加入模型 3 中。最后，我们删除港澳台资企业的数据，以东南亚资企业为基准建立模型 4。

表 2 变量定义表

变量	含义	变量说明
因变量	LS	劳动收入份额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利润+固定资产折旧+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自变量	FDI	外资企业 若企业股权性质为外资企业则为 1，否则为 0
	FDI1	欧美资企业 若实际控制人来自欧美地区则为 1，否则为 0
	FDI2	东南亚资企业 若实际控制人来自东南亚地区则为 1，否则为 0
	FdDI3	港澳台资企业 若实际控制人来自港澳台地区则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指标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PRO	营业利润率 企业净利润/企业年末总资产
	CI	企业资本密集度 企业固定资产资产/年末员工总数
	PER	企业股权集中度 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LEV	企业资本结构 企业年末总资产/企业年末总负债
	AVEPAY	企业员工平均工资 企业应付职工薪酬/员工人数

表 3 样本行业分类表

行业	样本数	比重 (%)
----	-----	--------

A 农、林、牧、渔业	236	1.23
B 采矿业	203	1.06
C 制造业	13992	72.80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51	0.79
E 建筑业	404	2.10
F 批发和零售业	728	3.79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2	0.95
H 住宿和餐饮业	20	0.10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88	7.74
J 金融业	125	0.65
K 房地产业	650	3.38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87	0.97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09	1.09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5	1.07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2	0.11
P 教育	11	0.06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56	0.29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8	0.62
S 综合	233	1.21
Total	19220	100.00

(三) 变量描述

表 4 是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分类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均高于民营企业。在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中，欧美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高于东南亚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其中东南亚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又高于港澳台资企业。

表 4 描述性统计表

	variable	N	mean	sd	min	max
港澳台企业	LS	837	.4679	.1708	.0694	.9163
	SIZE	837	21.1005	1.2166	18.1257	26.7912
	PRO	837	.0606	.0540	.0001	.8631
	CI	837	2.2739	1.9754	.1585	36.2354
	PER	837	65.3764	14.7336	19.55	100
	LEV	837	.3842	.2038	.0079	.0079

	AVRPAY	837	11.3852	.5815	8.9172	12.9274
东南亚企业	LS	240	.4694	.1185	.0585	.9906
	SIZE	240	21.3675	1.6331	17.4063	25.6878
	PRO	240	.0681	.0558	.0009	.3045
	CI	240	5.9047	13.4184	.1713	120.8566
	PER	240	67.5987	15.3763	19.83	100
	LEV	240	.3968	.1999	.0506	.9407
	AVRPAY	240	11.6780	.5489	10.5053	13.2347
欧美企业	LS	419	.4789	.1418	.1549	.9868
	SIZE	419	21.3134	1.5776	17.4013	27.7197
	PRO	419	.0676	.0534	.0002	.3464
	CI	419	3.7428	7.7593	.3035	50.2914
	PER	419	66.1358	16.1992	20.79	100
	LEV	419	.4042	.2371	.0242	.9779
	AVRPAY	419	11.5883	.5850	9.9649	13.1228
民营企业	LS	15777	.4383	.1822	.0011	.9995
	SIZE	15777	21.0002	1.2442	12.5508	26.3782
	PRO	15777	.0604	.0518	.0001	.7858
	CI	15777	2.7566	43.1149	.0881	0.757
	PER	15777	61.6659	15.1555	3.588	100
	LEV	15777	.3642	.1904	.007	.9957
	AVRPAY	15777	11.3483	.6065	4.8745	14.4138

表 5 差异性分析表

变量	外资组		内资组		差异性检验
	n	mean	n	mean	Meandiff
LS	1497	0.471	15777	0.438	0.033***
SIZE	1497	21.242	15777	21.016	0.226***
PRO	1497	0.064	15777	0.061	0.003**
CI	1497	3.261	15777	2.760	0.501
PER	1497	66.041	15777	61.669	4.372***
LEV	1497	0.392	15777	0.364	0.028***
AVRPAY	1497	11.479	15777	11.349	0.129***

四、实证检验

（一）外资企业的资本来源与劳动收入份额

表 6 为民营企业 and 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回归的分析结果。本文自变量为多分类有序变量，为了检验资本来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保留数据中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是中国内生的，对中国社会环境较为熟悉且不存在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

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往往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最低的。

本文以民营企业为基准,利用模型 1 比较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由结果可以看出,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民营企业 ($t = 5.57, P < 0.01$)。模型 2 同样以民营企业为基准,我们分别将欧美资企业、东南亚资企业及港澳台资企业加入模型中。结果显示,欧美企业 ($t = 6.28, P < 0.01$)、东南亚资企业($t = 4.90, P < 0.01$)和港澳台资企业($t = 1.74, P < 0.01$)的劳动收入份额均高于民营企业。欧美企业和东南亚企业在 1%的水平下显著,港澳台企业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随后,我们删除数据样本中的民营企业,仅保留外资企业的数据,以港澳台资企业为基准,将欧美资企业、东南亚资企业加入模型 3 中,结果显示,欧美企业 ($t = 4.71, P < 0.01$)和东南亚资企业 ($t = 4.37, P < 0.01$)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高于港澳台资企业。这与我们的假设 2 一致,港澳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欧美企业和东南亚企业。

最后,本文删除港澳台企业的数据,以东南亚企业为基准建立模型 4。结果表明,欧美资企业 ($t = 2.08, P < 0.01$)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高于东南亚资企业。结合模型 3 的结论,可以验证我们的假设 1 和假设 3,东南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欧美企业,但显著高于港澳台企业。欧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东南亚企业和港澳台企业。

总的来说,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由高到低的排序为: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港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

表 6 外资企业资本来源对劳动收入份额回归结果

	(1)	(2)	(3)	(4)
	LS1	LS	LS	LS
FDI	0.036*** (5.57)			
FDI1		0.077*** (6.28)	0.136*** (4.71)	0.069** (2.08)
FDI2		0.069*** (4.90)	0.171*** (4.37)	
FDI3		0.014* (1.74)		

SIZE	-0.031*** (-18.44)	-0.031*** (-18.50)	-0.051*** (-7.00)	-0.041*** (-4.10)
ROA	-1.701*** (-80.34)	-1.700*** (-80.36)	-1.050*** (-15.76)	-1.042*** (-9.13)
CI	-0.000*** (-4.10)	-0.000*** (-4.14)	-0.003*** (-3.02)	-0.002* (-1.95)
PER	-0.001*** (-14.13)	-0.001*** (-14.26)	-0.001*** (-4.77)	-0.001*** (-3.19)
LEV	0.109*** (14.37)	0.109*** (14.45)	0.178*** (6.22)	0.097** (2.34)
AVRPAY	0.047*** (17.82)	0.047*** (17.82)	0.036*** (3.43)	0.023* (1.67)
_cons	0.592*** (14.20)	0.595*** (14.29)	1.115*** (5.68)	1.181*** (4.72)
N	17,273	17,273	1,496	659
R-squared	0.449	0.450	0.315	0.286
industry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year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在前文的理论推演与实证分析中,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存在差异的,并将外资企业根据资本来源地区分为三类。为验证上述分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本文选取外资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对资本来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以下做出进一步讨论。本文对外资企业的界定方式是其实际控制人的国籍是否来自中国大陆。因此,当外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股权比例越高,我们认为其对该公司有较大的实际控制权和表决权,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采用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作为衡量大股东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并预期企业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越高,母国特征在企业中的影响程度越大。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与股权性质的交互项与劳动收入份额在5%的置信度下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当外资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更集中时,加强了资本来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

表7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调节效应

	(1)	(2)	(3)	(4)
FDI	0.022*** (2.73)	0.034*** (4.22)		
LargestHolder	-0.002***	0.000**		

		(-11.01)	(2.44)		
	c_FDI*c_LargestHolder		0.001***		
			(2.92)		
	FDI1		0.031***	0.023**	
			(3.15)	(2.32)	
	LargestHolder		-0.002***	-0.002***	
			(-16.73)	(-16.84)	
	c_FDI1*c_LargestHolder			0.003***	
				(4.56)	
	FDI2				
	LargestHolder				
	c_FDI2*c_LargestHolder				
	FDI3				
	LargestHolder				
	c_FDI3*c_LargestHolder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_cons	0.793***	0.797***	0.501***	0.501***
		(16.15)	(16.22)	(14.55)	(14.70)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14,774	14,774	14774	14,774
	AdjR ²	0.215	0.215	0.019	0.019
续表					
		(5)	(6)	(7)	(8)
	FDI				
	LargestHolder				

c_FDI*c_LargestHolder				
FDI1				
LargestHolder				
c_FDI1*c_LargestHolder				
FDI2	0.075***	0.062***		
	(3.17)	(2.98)		
LargestHolder	-0.002***	-0.002***		
	(-16.62)	(-16.78)		
c_FDI2*c_LargestHolder		0.002***		
		(4.89)		
FDI3			0.047***	0.032***
			(4.12)	(3.68)
LargestHolder			-0.001***	-0.001***
			(-16.84)	(-16.78)
c_FDI3*c_LargestHolder				0.001***
				(5.2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_cons	0.793***	0.797***	0.793***	0.797***
	(16.15)	(16.22)	(16.15)	(16.22)
N	1,496	1,496	659	659
AdjR ²	0.315	0.315	0.286	0.286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方式

为了避免由劳动收入份额的测量方法引发的偏差，我们参照方军雄（2011）、魏下海等（2013）的处理方法，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重新测算。具体测量方式如下：

- (1) 劳动收入份额(LS1)=支付给职工的薪酬/营业收入
- (2) 劳动收入份额(LS2)=支付给职工的薪酬/期末总资产

由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取值区间为（0，1），为了使劳动收入份额在取值上更加符合正态分布，参考方军雄（2011）的处理方式，对劳动收入份额取对数几率： $\ln LS = \ln(\text{LaborShare} / (1 - \text{LaborShare}))$ 结果如表 8 所示，外资企业的资本来源与职工劳动收入份额仍显著相关，与本文的结论一致。

表 8 稳健性检验表

	(1)	(2)	(3)	(4)	(5)	(6)	(7)	(8)
	LnLS1	LnLS1	LnLS1	LnLS1	LnLS2	LnLS2	LnLS2	LnLS2
PRI	0.025*** (0.002)				0.212*** (0.019)			
FDI1		0.015** * (0.003)	0.012*** (0.003)	0.016* (0.009)		0.103* ** (0.037)	0.109*** (0.038)	0.069* (0.038)
FDI2		0.010** * (0.002)	0.008*** (0.003)			0.095* ** (0.029)	0.098*** (0.031)	
FDI3		0.002 (0.002)				0.044* (0.026)		
SIZE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10** (0.004)	-0.024*** (0.008)	-0.041* ** (0.013)	-0.029* (0.015)	-0.044* * (0.019)
ROA	0.010*** (0.000)	0.010** * (0.000)	0.007*** (0.001)	0.027*** (0.002)	-5.173*** (0.165)	-5.975* ** (0.263)	-5.963*** (0.339)	-6.070* ** (0.439)
CI	0.022*** (0.003)	0.022** * (0.003)	0.023*** (0.004)	0.053*** (0.017)	0.030*** (0.007)	0.006* * (0.002)	0.006** (0.003)	0.004 (0.004)
PER	-0.517*** (0.011)	-0.516** * (0.011)	-0.449** * (0.015)	-0.750** * (0.063)	-0.151*** (0.047)	-0.002 (0.010)	-0.010 (0.014)	0.018 (0.017)
LEV	-0.020*** (0.006)	-0.020** * (0.006)	-0.129** * (0.042)	-0.203** (0.088)	-5.942*** (0.179)	-0.351* ** (0.075)	-0.316*** (0.097)	-0.186 (0.123)
AVR PAY	-0.027*** (0.009)	-0.027** * (0.009)	-0.025* (0.013)	-0.082* (0.049)	-0.689** (0.317)	-4.757* ** (0.281)	-5.153*** (0.347)	-5.131* ** (0.412)
_con s	1.480*** (0.082)	1.478** * (0.082)	1.323*** (0.096)	2.490*** (0.171)	15.312*** (0.455)	12.702 *** (0.675)	13.505*** (0.844)	13.728* ** (0.969)
N	17,273	17,273	1,496	659	19,186	19,186	1,751	761
R-sq uaed	0.449	0.450	0.315	0.286	0.157	0.152	0.140	0.149

industry	固定							
provision	固定							

五、进一步经验证据与分析

（一）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

我们对各年度不同资本来源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绘制了不同资本来源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图。结果如表 9 与图 1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首先，除欧美企业外其他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欧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整体仍维持在高水平状态。十七年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由高到低排序为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港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母国社会的约束有关。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差异减弱，外加外资企业团队呈本土化的趋势，但母国社会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约束依然存在。以欧美企业为例，随着欧美企业进入中国的时间的增加，对中国市场环境和法律体系了解的信息增多和管理团队的本土化，欧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可能由于欧美企业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收入分配方式，在法律的弹性空间内不再选择完全遵守法律文本，而是像其他企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向执法实践靠拢。在非法律层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模式。但尽管欧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生了小幅度的下降，受到母国社会的约束其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依然高于其他企业，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仍是显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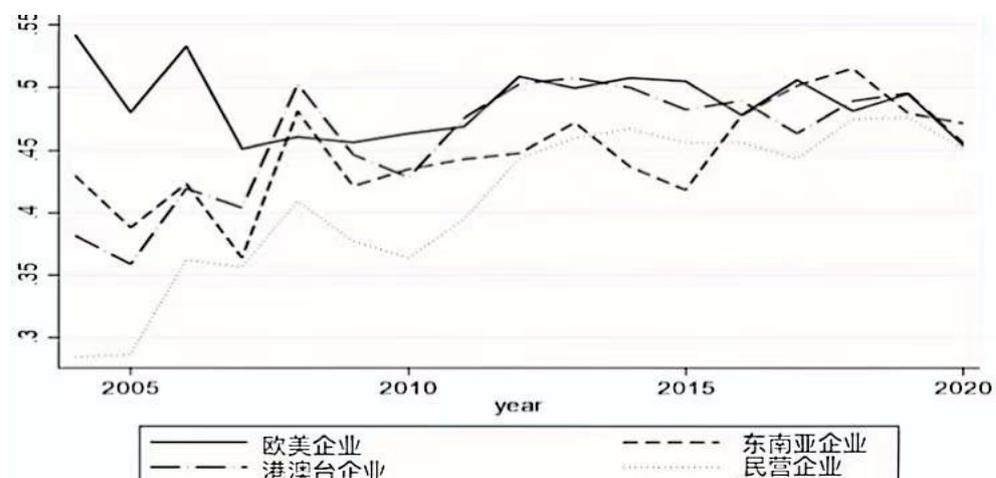
其次，这十七年间除欧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小幅度的下降趋势外，其他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基本都处于上升的趋势。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总体来说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最低的，是中国企业层面的“底线”。与 2004 年相比，2020 年中国总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得到了明显提高，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底线抬升”的趋势。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我们认为是在中国法律文本和执法时间的差异下，不同资本来源的企业选择在收入分配时的战略倾向不同。我们推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法律文本和执行方式的差异，并着手弱化这一差异。

此外我们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底线抬升趋势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廉价劳动力出现短缺，雇主开始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吸引工人，因而引起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普遍和持续上涨（Lewis, 1972；A. Michael Spence, 2021；蔡昉，2022）。在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状况不发生较大改变时，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最终展现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水平的上升。中国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影响了企业职工的议价能力和工资水平，进而对企业职工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

表 9 各年度不同资本来源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描述性统计表

year	MidFDI1	MidFDI2	MidFDI3	MidPRI
2004	0.5421	0.4298	0.3818	0.2848
2005	0.4800	0.388	0.3587	0.2866
2006	0.5328	0.4234	0.4196	0.3622
2007	0.4513	0.3638	0.404	0.3565
2008	0.4606	0.481	0.5028	0.4094
2009	0.4562	0.4214	0.4467	0.3773
2010	0.4633	0.4348	0.4283	0.3639
2011	0.4688	0.4429	0.4756	0.3948
2012	0.5086	0.4477	0.5027	0.4437
2013	0.4994	0.4721	0.5074	0.4598
2014	0.5075	0.4367	0.4998	0.4673
2015	0.5048	0.4183	0.4822	0.4557
2016	0.4778	0.4775	0.4893	0.4562
2017	0.5058	0.5014	0.4634	0.4435
2018	0.4811	0.5150	0.4891	0.4749
2019	0.4948	0.4794	0.4953	0.4764
2020	0.4536	0.4715	0.4557	0.4511

图 1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图



（二）不同资本来源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向民营企业的“趋同”趋势

在前文的理论推演中，本文提出企业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会影响企业的管理者参照主体的选择以及其决策风格，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但由文化、制度环境的差异引发的信息搜寻成本差异可能会随着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间的增加而渐减少甚至消失。为验证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随着时间的推进的趋势，本文将年份视为一种“调节变量”。我们设定变量 $yr=2021-year$ 为对 2004-2020 年分别赋值 1-17 的年份“调节变量”。表 10 为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时间趋势检验结果。表 10 列（1）和列（2）为欧美企业和民营企业数据，列（3）和列（4）为东南亚企业和民营企业数据，列（5）和列（6）为港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数据。表 10 列（2）、列（4）和列（6）的结果显示，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系数始终为正（ $\beta_{FDI1} = 0.156$ ； $\beta_{FDI2} = 0.267$ ； $\beta_{FDI3} = 0.143$ ），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高于民营企业。从交互项系数上看，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与年份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且均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年份的负向调节作用在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中显著，即欧美企业、东南亚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敛，但它们的劳动收入份额仍然显著高于民营企业。

我们认为这一变化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随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间的增加，由制度距离引发的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获取信息难易程度差异逐渐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类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都对中国市场有了足够的了解在市场压力下可能会改变其收入分配方式，以达到资方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管理层、法律团队和员工中本地居民所占的比例随着时间显著提升(Beck.T & Levine.R,2012)，外资企业的员工团队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员工团队的本土化降低了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企业获取中国市场信息程度的差异，管理团队的决策行为受信息搜寻成本的制约程度减弱。此外，外资企业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利益连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确。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能够拉动当地 GDP 的增加，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的完成。为了吸引更多外商投资，在劳动者与资方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会更偏向资方的而非劳动者。这对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企业职工劳动

收入份额都有着负面的影响（罗长远和张军，2009）。

表 10 时间调节效应表

	LS					
	(1)	(2)	(3)	(4)	(5)	(6)
FDI1	0.184*** (11.3)	0.156*** (11.3)				
FDI2			0.211*** (21.6)	0.267*** (13.1)		
FDI3					0.139*** (17.4)	0.143*** (21.6)
FDI1*yr		-0.005*** (-11.46)				
FDI2*yr				-0.007*** (-11.30)		
FDI3*yr						-0.011*** (-19.67)
m_year	0.051*** (0.003)	0.053*** (0.003)	0.052*** (0.003)	0.053*** (0.003)	0.052*** (0.003)	0.053*** (0.003)
_cons	17.806*** (1.413)	0.936*** (1.413)	18.615*** (1.291)	18.601*** (1.292)	18.030*** (1.316)	18.029*** (1.315)
Control		YES		YES		YES
pro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N	17,674	17,674	17,396	17396	17490	17490
AdjR ²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0.173

六、结论

资本来源是影响外资企业收入分配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核心要素。本研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资本来源对企业收入分配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资本来源的外资劳动收入份额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外资企业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越大，不同资本来源地区外资企业间的收入份额的差异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实际控制人持股闭月越高，外资企业受母国制度、文化等因素

的影响更明显。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越长,不同资本来源地区的外资企业间对中国市场的信息获取差异缩小,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向中国民营企业趋同。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实证证据,证明资本来源在外资企业收入分配行为方面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或对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和以及劳动保护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社会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企业的收入分配决策和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研究发现,当资本来源地区对劳动者权益更为重视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该资本来源地区的外资企业在收入分配是更多地考虑到劳动者的权益,有相对较高的劳动收入份额。中国社会应提高劳动者权益保护意识,积极维护劳动者权益。其次,在劳动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的弹性空间内,随着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熟悉程度增加,信息获取难易程度的差异减弱,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外资企业的收入分配决策行为或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维护劳动者权益,应尽快完善本国劳动者权益相关法律,明确劳动者拥有的权利带。此外,中国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去协助劳动者权益相关法在现实层面有效执。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44(03):27-41.
- 白重恩,钱震杰.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0,33(12):3-27.
-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2(04):9-20
- 江小涓.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1999(02):7-15+219.
- 姜磊,郭玉清.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趋于下降?——基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观察与解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01):211-217.
- 姜磊,张媛.对外贸易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10):26-33.
- 蒋冠宏.企业异质性和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企业的检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5(12):81-96.
- 蒋为,黄玖立.国际生产分割、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4,37(05):28-50.
-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44(01):70-82.
- 刘慧.企业异质性、出口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视角的Stolper-Samuelson定理检验[J].当代经济科学,2013,35(03):54-62+126.
- 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05):25-35.

- 邵敏, 黄玖立.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0, 9(04):1189-1210.
- 唐东波. 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劳资议价能力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1(8): 23-33
- 田巍, 余淼杰.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2, 11(02):383-408.
- 王立文. 不同来源跨国资本在中国 FDI 的比较研究[J]. 财经研究, 2007(06):29-42.
- 王舒鸿. 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J]. 财经研究, 2012, 38(04):59-68.
- 王雄元, 黄玉菁. 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 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04):135-154.
- 伍山林.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 一个微观模型[J]. 经济研究, 2011, 46(09):55-68.
- 伍山林. 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6, 51(02):97-110.
- 肖文, 周明海.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收入法 GDP 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 32(03):69-76+126.
- 张杰, 陈志远, 刘元春.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J]. 经济研究, 2013, 48(10):124-137.
- 张莉, 李捷瑜, 徐现祥. 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J]. 经济学(季刊), 2012, 11(02):409-428.
- 周茂, 陆毅, 陈丽丽.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5(11):70-86.
- 周明海, 肖文, 姚先国. 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J]. 管理世界, 2010(10):24-33.
- Acemoglu D, Guerrieri V.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116(3):467-498.
- Acemoglu D. Changes in Unemployment and Wage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9,89(5):1259-1278.
- Acemoglu D. Patterns of Skill Premi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3,70(2):199-230.
- Acemoglu,Daron.When Does Labor Scarcity Encourage Innov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18(6): 1037-1078.
- Alvarez-Cuadrado F, Van Long N, Poschke M . 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Labor Income Share[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8,87:206—231.
- Benmelech E , Bergman N K , Kim H . Strong Employers and Weak Employees: How Does Employer Concentration Affect Wages?[J]. *NBER Working Papers*, 2018.
- Blanchard O,Giavazzi F.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Goods and Labor Marke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3): 879-907.
- Bleul C C , Boehm T . Chemokines define distinct micro environments in the developing thymus[J].*European Journal of Immunology*, 2015, 30(12):3371-3379.
- Buchner,A.Espenlaub,SKhushedACross-border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The Impact of Foreignness on Retur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8,49(5):575-604

- Bruno, Cassiman, and, et al. Innovation, exports and productiv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0.
- Chen, Meei-shia and Anita Chan. 2004. "Employee and Union Inputs int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in Chinese Factor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8(7), 1231-1245.
- Daron, Acemoglu, Pol, et al. 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
- Decreuse B , Maarek P . FDI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J]. *Working Papers*, 2008.
- Diez F , Leigh D , Tambunlertchai S . Global Market Power and its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J].*IMF Working Papers*, 2018.
- Economists. A Workers' Manifesto for China: How Workers Are Losing Out in China,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J]. *Economists*, 2008, 1: 34-57.
- Elsby M W L , Hobijn B , Sahin A . Reserve System.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ticipation Margin for Labor Market Fluctuation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3, 72(may):64-82.
- Growiec J , Mcadam P , Muck J . Endogenous Labor Share Cycl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8, 87(02.):74-93.
- Grullon G , Larkin Y , Michaely R . Are US Industries Becoming More Concentrated?[J]. *Review of Finance*, 2019.
- Harrison, A. E. 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 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R]. *UC Berkeley and NBER*, October, 2002, Working Paper.
- Henningsen A, Henningsen G. On Estimation of the CES Production Function—Revisited[J]. *Economics Letters*, 2012, 115(1):67-69.
- Josheski D, Lazarov D, Koteski C .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sited, VAR and VECM Analysis and a Note on Fischer Cobb-Douglass Paradox[J]. *Electronic Journal*, 2011.
- Kabaca S. Labour Share Fluctu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Role of the Cost of Borrowing[J]. *Staff Working Papers*, 2014.
- 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C]/F. A. Lutz, and D. C. Hague. *The Theory of Capital*.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1961.
- León-Ledesma, Miguel A, Mcadam P, Willman A . Identifying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with Biased Technical Chang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4):1330-1357.
- Morel L. A Sectoral Analysis of Labour's Share of Income in Canada [J].*Working Paper of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Canada, 2005.
- Noda H, Kyo K . Bayesian estimation of the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with capital- and labour-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J]. *Asian J.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2015,2(1):61.
- Orgiazzi E .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stability: The role of the labour share[J].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08, 62(4):215-236.
- Shi.YZ.“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trategy of Firms:The Ca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1, 36(2) pp.184-204

Stockhammer E. Why Have Wage Shares Fallen? A Pane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J]. *ILO Working Papers*, 2013.

Swiecki T. Determinants of Structural Change[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7, 24:95-131.

Zuleta, H. Factor Saving Innovations and Factor Income Shares[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8, 11 (4): 836-851.

Region of capital source and labor income share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LIU Lei^a and CHEN Yiyi^b

(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b: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capital source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their labor income sha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is examined in this study. We discover that there are variances in the labor income share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with diverse regional origins using panel data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20. The labor income shares are rated from high to low as follows: European and American enterprises, Southeast Asian enterprises,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nterprises an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regional source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Differences in labor income share between regions are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the equity percentage of the actual controller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he higher the equity ratio of effective controller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capital source regions, the greater the impact of the capital source region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on their labor income share differences. As the time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lengthens,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foreign-invested firms from various capital source regions to converge towards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enriching knowledge about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Keywords: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Region of Capital Source; Labor Income Share